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藏史谛考



丛书主编 余太山
周伟洲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藏史论考

丛书主编 余太山
周伟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史论考/周伟洲著.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11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524-2

I. ①藏… II. ①周… III. ①藏族—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486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藏史论考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周伟洲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524-2
定 价	5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前言

这本集子是作者近五年来,在承担和完成关于藏族史志的国家重点课题的过程中,陆续撰写的一些心得,大部分论文已先后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因皆为藏族在唐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内有史实的考辨,也有历史的论述,故名之为《藏史论考》。

关于作者从事藏族史学习和研究的情况,在作者于2006年出版的《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的前言中,已有记述。人一生的生活轨迹真难预测,作者自己也不会想到,从20世纪60年代追随马长寿师,学习藏族史,到80年代至21世纪初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如今到晚年,又回到原学习的专业藏族史的研究之上,真令人感慨万千。

此集共所收录的14篇论文,按时代和内容可分为4组,即唐代吐蕃与唐朝及其他民族关系的论文3篇;清代藏族史论文3篇;甘青及川边藏区史3篇;民国时期藏族史5篇。内容涉及藏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

关系等诸多方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集子内论文存在问题不少,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周伟洲

2009年12月

后记

目录

前言 / 1

1 唐蕃长庆会盟地与立碑考 / 1

1.1 长庆元年长安会盟地点 / 1

1.2 唐蕃长庆会盟所立碑石 / 5

2 唐代吐蕃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研究 / 10

2.1 吐蕃与突厥的关系 / 10

2.2 吐蕃与回纥的关系 / 22

2.3 吐蕃与沙陀的关系 / 30

3 吐蕃与南诏 / 35

3.1 吐蕃与唐朝对西洱河诸蛮的争夺及 神川都督府的建立 / 35

3.2 南诏统一五诏及与吐蕃的关系 / 39

3.3 南诏与吐蕃联盟及两者的关系 / 43

3.4 南诏重新附唐及其与吐蕃之关系 / 48

3.5 吐蕃与南诏经济、文化的交往 / 52

4 清驻藏兵制考 / 55

4.1 清朝驻藏兵制的初步形成 / 55

4.2 清朝驻藏兵制的完善和成为定制 / 59

- 4.3 清后期驻藏兵制的流弊和变革 / 64
- 5 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 / 67
 - 5.1 关于然吉森、索热森和谷朗森 / 67
 - 5.2 西藏森巴战争最后一战谁是胜者? / 68
 - 5.3 西藏拉达克地区何时被侵占? / 72
- 6 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 / 75
 - 6.1 问题之提出 / 75
 - 6.2 关于琦善等奏呈《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 / 77
 - 6.3 关于琦善奏罢稽查商上收支问题 / 82
 - 6.4 关于改订藏兵和驻防清军建置章程问题 / 83
 - 6.5 结语 / 86
- 7 甘青地区的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 88
 - 7.1 唐代甘青地区吐蕃的来源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 88
 - 7.2 宋代甘青吐蕃与当地的经济开发 / 93
 - 7.3 元明时期甘青藏族及其经济的发展 / 98
 - 7.4 清代甘青藏区的经济发展 / 107
 - 7.5 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 / 111
 - 7.6 结语 / 115
- 8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藏族社会研究 / 117

- 8.1 行政建制 / 118
- 8.2 藏族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 / 131
- 8.3 社会组织 / 152
- 9 试论清代松潘藏区的“改土设弁” / 156
 - 9.1 清初松潘藏区的土司及分布 / 157
 - 9.2 松潘之“庚申番变”与“改土设弁” / 161
 - 9.3 余论 / 164
- 10 1930年—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 / 165
 - 10.1 大金寺与白利乡争产纠纷引发的康藏战争 / 165
 - 10.2 国民政府派员调解失败与战事之扩大 / 169
 - 10.3 《岗拖协议》与《青藏和约》 / 173
 - 10.4 英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 178
 - 10.5 战争的历史根源、性质及影响 / 181
- 11 1932年—1933年西藏的政局 / 186
 - 11.1 西藏与康、青战争的影响和达赖喇嘛的“公开信” / 186
 - 11.2 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论争及中央国民政府的调解 / 190

- 11.3 关于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 195
- 11.4 结语 / 198
- 12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上层集团
争夺权力的斗争 / 200
 - 12.1 土丹贡培事件 / 200
 - 12.2 邦达昌事件 / 207
 - 12.3 龙夏的改革及失败 / 211
- 13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及其
意义 / 218
 - 13.1 民国初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复兴及
特征 / 218
 - 13.2 民国后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兴盛及
意义 / 223
- 14 民国时期西藏与英国的贸易及其
影响 / 239
 - 14.1 藏英贸易的增长及其特征 / 239
 - 14.2 藏英贸易的影响 / 245
- 人名地名索引 / 249

1 唐蕃长庆会盟地与立碑考

关于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年)唐蕃会盟,中外学者研究颇为深入,发表论著甚多。然而,对会盟的一些问题,因所据汉藏文献记载之不同,而意见分歧。比如长庆元年于唐京师长安会盟的地点及会盟所立碑的情况,中外学者即有不同的看法,且众说纷纭。笔者不揣冒昧,想就以上两个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求正于专家、读者。

1.1 长庆元年长安会盟地点

关于长庆元年在长安会盟的地点,最早见于记载的应是至今保存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又称为长庆会盟碑,立于长庆三年)背面(东面)古藏文碑文,内云:“……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Keng-shi)西隅 Shen-san-si(或转写作 Ceg-san-ci)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羊(辛丑)冬十月十日。”^{〔1〕}此碑正面汉文部分未提及长安会盟及地点。

又汉文史籍两《唐书》之《吐蕃传》及《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条,均记此次长安会盟情况。其中,《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与上引《册府元龟》还录有长安会盟之誓词,内云:“越岁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诏丞相臣植……与大将和蕃使、礼部尚书论纳罗等,会盟于京师,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也记此次长安会盟,在“京师西郊”,均未记会盟之具体地点。

〔1〕译文引自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3页及59页注51。

可是,《唐会要》卷97“吐蕃”条却明确记载:“十月,命宰相崔植等十四人与吐蕃使论纳罗盟于郡城西王会寺”。

中外学者依据上述各种汉藏文献的有关记载,提出了对此次长安会盟地点的不同看法:

(1)中国著名的藏学家王尧先生在译注拉萨唐蕃会盟碑时,直接将上述碑文中的“Shen-san-si”译作“兴唐寺”,理由是永泰元年三月,唐蕃会盟在兴唐寺。^[1]事实上,据《册府元龟》卷981记,唐永泰元年三月和大历二年四月,唐蕃会盟均在兴唐寺。可是,兴唐寺在长安城中东边大宁坊内,不在长安城西郊,明显与上述各种记载不符,故中外学者多不同意此说。

(2)日本藏学家佐藤长于1977年再版的名著《古代チベット研究》下卷附录《唐蕃會盟碑の研究》注中,说碑中“Ceg-san-ci”与《唐会要》所记“王会寺”不一致,如要强求之,则此地当系长安西南郊之“香积寺”,此寺在至德二载(757年)曾为郭子仪所夺回;或者系碑文所记寺名有误耶。^[2]香积寺为唐代著名寺院,在长安西南郊,而不在西郊,且上述两《唐书》、《册府元龟》对此著名寺院应当记入,而未记,可见此说亦有疑问。

(3)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R. Stein)于1988年《通报》第74卷,发表一篇题为《公元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盟誓考》的论文,在注中提出:王尧说,“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有一项条约曾在兴唐寺缔结。然而,‘兴唐寺’也不可能拼写成Ceg-san-si。我倒想,正如用ken-ci来拼写‘京师’一样,Ceg-san-si拼写的也并非专门名词,而是一个普通名词。说不定就是‘释僧寺’。”^[3]

(4)中外学者公认研究唐蕃会盟碑的权威学者李方桂和其高足柯蔚南合著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原著为英文,1987年台北出版),引

[1]参见上引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碑文译注。其依据见《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又见同书卷11《代宗纪》以及《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条。

[2]见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研究》下卷,东京,同朋舍昭和五十二年再版,第927页。

[3]此文由刘立德译为汉文,载《国外藏学动态》第4期,1990年内刊。

《唐会要》说,长安会盟是在京师西王会寺完成的,而对碑文记 Shen-san-si 一词,则认为“尚难确定”,并引王尧在注释唐蕃会盟碑时所记,张克强最近研究中说,“可能是石羊寺”。^{〔1〕}

(5) 中国学者张克强在 1981 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 2 期上,发表一篇《读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文内如上述,认为碑中 Shen-san-si 一词,系《出三藏记集》等佛教典籍所云之石羊寺。按,查僧佑《出三藏记集》(苏晋仁等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5 年)诸书记“石羊寺”在关中长安,但均在公元 4 世纪末 5 世纪初后秦(姚秦)姚兴(394—415 年在位)于长安石羊寺弘法、译经之时。事隔四五百年,此寺早已不存,更何得在吐蕃古藏文书刻之会盟碑内出现?就是唐宋有关长安的文献中,也无石羊寺之名。因此,张氏之说,难以成立。

以上五种说法的根据,首以《唐会要》所记之“王会寺”最为直接和可信,但是如何理解此“王会寺”,则为关键之问题。我以为,此王会寺并非确指一佛教寺院,而是专为唐蕃会盟,在京师长安西郊筑誓坛而建之暂时官署名。“寺”古代为官署名,如太常寺、鸿胪寺之类。“王会”者,如上述石泰安所云,“‘王会’二字似乎暗指两国专使为缔约而聚集在一起,称为‘会盟’”。理由是:

(1) 如果是京师长安西郊一佛教寺院,又为唐蕃会盟之地点,则唐宋有关长安的地志、佛教典籍或文献应有“王会寺”、“石羊寺”、“释僧寺”或“Shen-san-si”的记载。可是,遍查有关文献典籍,均无上述名称之寺院,说明上述名称之“寺”,只可能是一种官署名,且为会盟暂时所设,会盟后再不见于记载。

(2) 早在肃宗元年(756 年)建寅月(一说在宝应元年,762 年),吐蕃使来朝请和,诏宰相等“将诣光宅寺为盟”。吐蕃使者提出:“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以中蕃之礼。从之。”^{〔2〕}可见,按当时吐蕃已信佛教之俗,忌杀牲于佛寺,故不

〔1〕此书汉文译本,系由王启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71—72 页。

〔2〕《册府元龟》卷 981,《外臣部》“盟誓”;《旧唐书》卷 196《吐蕃传》上。

愿在佛寺内杀牲盟誓。^{〔1〕} 后来虽有永泰元年(765年)和大历二年(767年),吐蕃使者与唐宰臣盟誓于兴唐寺,但此为小盟,以唐为主使。可是到建中四年(783年)唐蕃的清水会盟,划定双方边界,据《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此年正月,双方于清水筑坛,先杀牲于坛北,“杂血二器而歃盟”,此为唐朝的盟誓习俗。“盟毕,结赞(尚结赞,吐蕃盟誓大臣)请鎰(张鎰,唐陇右节度使,盟誓大臣)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于坎,但埋牲而已。”此为吐蕃盟誓之俗。自此以后,即为唐蕃会盟之基本程序,照顾到双方之习俗。因此,长庆元年长安唐蕃会盟不可能再在长安西郊一佛寺内举行。

(3)唐蕃长庆会盟的程序与地点,应是按建中清水会盟而来。不同之处是,建中清水会盟先于边界清水筑坛会盟,划定边界,然后,再于唐京师长安和吐蕃拉萨盟誓。据上引《册府元龟》记,建中四年“七月,以国子祭酒李揆为礼部尚书、御使大夫、入蕃会盟使”;旋又在京师长安筑坛,诏宰相尚书与吐蕃宰相尚结赞,“盟于清水之约”。原订筑坛于城内丰邑坊,后吐蕃一方提出:“以丰邑坊盟坛在京城之内非便,请卜坛于京城之西,其礼如清水之仪。”^{〔2〕}所谓“卜坛于京城之西”,《旧唐书·吐蕃传》云“唯德宗建中末,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长安城西三门之南门)……”则京城之西,即延平门外占卜之地,建坛会盟。而长庆元年唐蕃先在长安会盟,次在吐蕃拉萨会盟,最后在双方边界附近盟誓。其原因是此年会盟时,边界早已于清水会盟时订立,故誓文中只有彼此谨守疆界之语。总之,长庆元年的长安会盟,应按照清水会盟后之长安会盟,如上引各种文献所说,其会盟地点也应是占卜后所建之“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亦即可能在延平门外。其仪式,“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3〕}也即无违清水会盟之

〔1〕详细论述,见上引石泰安《公元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盟誓考》文。

〔2〕又详见上引《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

〔3〕上引《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引长安会盟誓词,内可能隐去下坛至吐蕃佛帐中“焚香为誓”的程序。